韩锋，程安祺．协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方法研究[J]．风景园林，2026，33（4）：62-71．

协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方法研究

韩锋 程安祺

摘要：【目的】世界自然遗产的在地保护需要依托各国法定的遗产管理与规划体系。风景名胜区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重要的法定管理主体之一，但其总体规划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要求存在衔接障碍。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协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方法，以通过法定规划落实世界遗产的保护。【方法】基于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要求的分析，识别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在资源认知与评价、空间分区逻辑、功能组织等方面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存在的衔接障碍，以价值体系、管理目标、空间边界为关键协同对象，构建协同规划框架，并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展开应用实践。【结果】提出三大规划策略：1）构建融合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及其载体的多层次资源与价值体系；2）对接世界遗产管理目标与空间管控边界；3）强化遗产价值解说与社区协同发展的专项规划，从而增强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要求的衔接性。该规划框架在武陵源的实践有效提升其总体规划对 OUV 的保护及对可持续旅游与社区发展的支持。【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协同规划框架，实现了国际遗产保护要求与本土规划体系的融合，为兼具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双重身份的自然保护地实现全要素保护、多规协同和精细化治理提供技术路径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遗产保护；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中图分类号：TU984.18 **文章编号：**1673-1530(2026)04-0062-10 **收稿日期：**2025-07-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24/j.fjyl.LA20250405 **修回日期：**2026-02-11

文章亮点：

1、创新性地将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要求融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构建“价值融合—目标与空间管控衔接—专项优化”的规划技术框架。

2、在武陵源案例中，构建了融合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资源与价值体系、分区边界对接机制与专项利用策略，并验证了该框架在强化遗产全要素保护与解说、优化游憩体验和促进社区发展方面的有效性。

3、回应了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下全要素保护、“多规合一”和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导向，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制下世界自然遗产的在地保护提供规划技术支撑与实践示范。

截至 2025 年 8 月，中国已成功申报 15 处自然遗产及 4 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这些遗产地通常是全球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地质演化和自然景观的关键代表，其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and universal values, OUV）的有效保护和管理，需依托各国的法定保护地与规划体系[1-2]。

在中国现行自然保护地体系中，风景名胜区是世界自然遗产（World Natural Heritage, WNH）最主要的申报与管理载体之一[3-4]。由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非国家法定规划，上述遗产地需要依托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简称风景区总规）作为实质管理依据。然而，二者在价值导向上的差异使得风景区总规难以全面落实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要求。中国风景名胜区是以自然为基底，体现文化与自然双向建构关系的自然文化融合遗产保护体系，具有杰出的文化景观价值[5]，这与世界自然遗产以自然科学与美学价值为核心的保护逻辑存在偏差。因此，风景名胜区相关法规政策与规划技术标准尚未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要求实现系统对接[6-7]，导致部分遗产资源长期处于保护“真空”[8]，这暴露出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多规协同的深层困境。

面对这一挑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制度层面，围绕管理体制、法规建设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策略[3, 8-9]。部分学者也关注到风景区总规与世界遗产管理规划的差异[6]，但在规划方法层面探讨风景区总规如何对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要求的研究仍属空白。

因此，本研究以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自然遗产多规协同的现实需求，系统分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要求和与风景区总规的衔接现状问题，并从资源认知与价值评价、空间分区与管控、专项规划体系 3 个层面，立足风景名胜区特色，构建风景区总规协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规划框架，进而应用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案例，为落实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和空间治理协同提供方法支撑。

1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关联性分析

1.1 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要求

依据世界遗产官方文件及相关研究[2, 10-13]，解读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与管理要求。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以保护（protect）、保存（conserve）、展示（present）和传播（transmit）OUV 为核心目标。在此总体框架下，遗产区（property）与缓冲区（buffer zone）作为管理空间的 2 个层次，具有不同但互补的功能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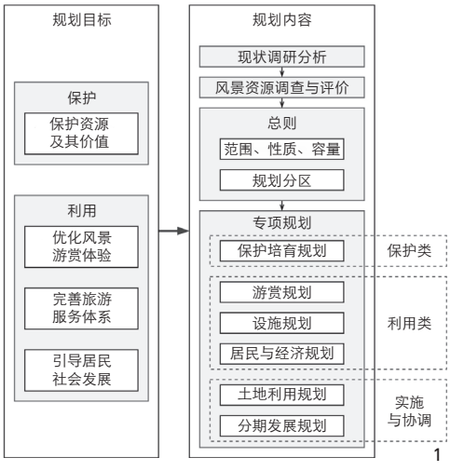
保护和管理的首要原则是“OUV 及其完整性①得到保持与加强”。自然遗产 OUV 标准涵盖美学（vii）、地学（viii）、生态学（ix）和生物多样性（x）共 4 项。完整性是指 OUV 及其载体的整体性与未受损害性，每类标准均有相应的完整性要求（表 1）。因此，识别构成 OUV 完整性的载体是保护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OUV 的保护不是孤立的，而是依赖于地方景观、区域生态系统、生物文化多样

©Beij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urnal Periodical Office Co., Ltd. Published b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urna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license.

表1 世界自然遗产OUV 标准及其完整性条件

Tab. 1 Criteria for OUV of WNH and its integrity conditions

世界自然遗产OUV标准	完整性条件
vii 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和美学价值的地区	具备突出的普遍价值，包括保持遗产美景所必需的关键地区
viii 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重要地质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	包括其自然关系中所有或大部分重要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因素
ix 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	具有足够的规模，且包含能够展示长期保护其内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过程的必要因素
x 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包括某生物区或生态系统内最具多样性的动植物特征的栖息地



1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规划目标与内容

Objectives and content of the general planning for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SHA)

性、传统生态智慧、精神与信仰等多层次、相互关联的自然文化价值基底[10, 14]。

其次，在确保 OUV 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可推动遗产的可持续利用。2012 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项目，将遗产旅游纳入保护框架，并视之为传递遗产价值、增强公众认知、推动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15-16]。此外，社区参与被认为是世界自然遗产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区既是遗产价值的承载者，也是价值保护的协作者，其深度参与有助于提升遗产管理的有效性与社会基础[17-18]。因此，管理目标还包括鼓励社区传统土地利用和生态友好型生计的发展、支持地方知识和精神的传承等。

在空间层次上，遗产区更强调 OUV 的保护与适度利用；缓冲区则承担协同保护、提供生态支持、开展教育游憩活动与促进社区发展等多重功能。二者虽侧重不同，但管理目标需协调一致。在实际管理中，依据保护强度和利用功能进行进一步分区（zoning）是普遍采用的规划工具[10]。

1.2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目标与内容

风景名胜区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它们完美地集设计的景观、有机演进的景观和关联性景观 3 类文化景观遗产资源于一体[19-21]。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精心设计和营建的作品，与非物质的哲学、文化、政治、艺术高度关联，经历了历史的千锤百炼，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5, 22]。围绕“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总体目标，风景区总规以涵盖自然、人文、文化景观的风景资源及其价值的保护为核心，并兼顾优化风景游赏体验、完善旅游服务体系、引导居民社会发展等多元目标[19]。

根据《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2018）》（简称《标准》），风景区总规可划分为四大板块：现状调查分析、风景资源调查与评价、总则性内容与各类专项规划（图 1）。资源调查与评价是规划的基础。总则部分聚焦于风景名胜区的基本结构，其中规划分区是总规的核心控制手段之一，包括保护分区与功能分区。前者依据资源价值等级设定保护强度，后者则根据保护与利用综合需求落实空间管控政策，从而实现从“严格保护”到“合理利用”的差异化空间管控。在此基础上，各项专项规划则进一步细化对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具体安排，涵盖资源保护培育、风景游赏组织、服务设施建设、居民社会调控与经济产业引导等方面[23]。此外，土地利用和分期发展构成不同专项间的协调机制与时序性支撑，确保规划目标的落地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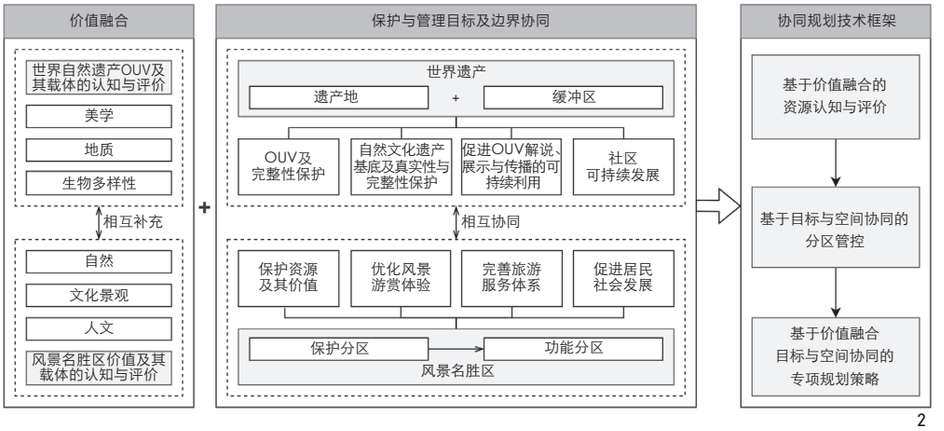
1.3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衔接问题

风景区总规在目标导向与规划技术上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管理具有一定衔接基础，但在价值认知、分区逻辑及管理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影响协同有效性。

首先，二者存在价值认知偏差。如前所述，风景名胜区作为自然文化融合遗产，其总规的价值认知体系包含自然、人文与文化景观 3 个维度。而世界自然遗产则强调自然科学与美学 OUV，包括自然美学、地质演化、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这种综合与聚焦的差异，导致规划实践中风景区总规虽能识别丰富的资源，但缺乏对 OUV 及其载体的系统识别，未能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从而造成后续规划缺乏针对世界遗产价值保护与利用的策略应对。

其次，空间划分逻辑的差异也构成重要障碍。世界自然遗产采用“遗产区—缓冲区”两级结构，体现保护强度与功能的递进关系，但不设定区域内部详细功能。风景区总规则依据资源评价结果划定一至三级保护分区，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以游赏和旅游服务为主导的功能分区。在实践中，分区逻辑差异带来了 2 类典型冲突：其一，若风景名胜区仅覆盖遗产区，缺乏 OUV 识别可能导致核心遗产资源未被纳入高等级保护分区，甚至误划入功能利用区；其二，若风景名胜区同时涵盖遗产区与缓冲区，除上述问题外，其功能分区划定常聚焦旅游服务与设施建设，忽略文化传承、社区参与等缓冲区应有功能，削弱了对遗产区的协同支撑。

上述分区逻辑偏差源自规划功能导向的差异。虽然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和风景区总规都包含旅游利用、社区发展的管理目标，但是二者在具体理念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世界自然遗产强调在不损害 OUV 的前提下，开展遗产价值的展示、教育传播及社区参与。而风景区总规则侧重于游赏组织与旅游设施



2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协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逻辑与技术框架

Logical and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general planning of SHA with WNH conservation

配套。上述差异进一步体现在具体规划策略层面：一方面，风景名胜区游赏规划中往往偏向于视觉审美景观，缺乏围绕 OUV 的解说与展示，导致核心遗产价值难以有效传达；另一方面，尽管总规中包含“居民社会调控与经济发展引导”内容，但许多规划实践未认识到乡村社区及其景观价值并将之纳入保护与利用框架，而是将社区被视为保护的限制因素，通过搬迁等手段弱化其参与，甚至引发严重的人地矛盾。

2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协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方法建构

尽管风景区总规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在价值认知、管理目标和分区管控上存在差异，但二者都强调基于遗产价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为协同提供可能性。针对上述衔接要点和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价值融合和目标与空间协同的两大理念，提出资源认知与价值评价、空间分区与管控、保护与利用专项规划策略 3 方面的协同规划技术框架（图 2）。

2.1 融合OUV，构建多层次资源与价值体系

资源识别与价值评价是实现风景区总规与世界遗产保护有效衔接的基础。世界自然遗产 OUV 位于价值体系金字塔的顶端，具有全球性的突出的自然价值；而风景名胜区则以其国家代表性为基础，强调对自然、人文和文化景观的综合保护。因此，协同世界自然遗产的风景区总规的保护对象是多层次的价值和资源体系：以风景名胜区整体的自然和文化景观为基底，OUV 及其载体则是该体系中被赋予最高保护级别的核心价值和资源。基于此，规划应在全面认知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融合价值的基础上，重点强化对其中 OUV 载体的精准识别与科学评估。

为实现这一目标，风景区总规需在原有对综合价值认知的基础上，重点强化对地质、生物多样性等具有全球意义的自然科学与美学价值的系统性调查与评估。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对文化景观资源及其复合价值体系的认知[22, 24]。其中，有机演进类和关联性文化景观资源与社区生计、地方知识紧密相关，是连接 OUV 与地方社会价值的关键纽带。在价值评价上，应在现行风景区总规的综合评价体系中，赋予 OUV 资源载体特级或一级资源等级，确保在空间分区中获得最严格的保护控制。

2.2 整合保护目标，衔接分区管控边界与管理导则

在明晰多层次资源与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风景区总规需要主动调整其空间分区逻辑，使之既能响应世界遗产的空间管理要求，又能满足自身保护目标。首先，在保护分级分区上，应确保所有构成 OUV 完整性的载体受到严格保护。其次，功能分区的划定应综合体现遗产的多重价值和管理目标。除了满足游赏需求，还应赋予特定区域生态支撑、文化传承与社区协同发展的功能，建立“刚性保护 + 弹性调控”并重的空间管理机制。为确保空间管理实效，在功能协同外，还需强化风景名胜区分区系统与世界遗产“遗产区—缓冲区”结构之间的边界匹配，避免规划分区与遗产边界错位，造成管理措施冲突。

2.3 围绕价值认知，制定游憩利用与社区发展策略

风景名胜区的专项利用策略，应主动回应世界遗产“保护—传播—共管”的理念。这意味着在新的协同框架下，风景名胜区需承担两大核心功能：1）价值阐释与传播功能，即如何通过有效的利用方式向公众展示遗产地的完整价值；2）人地关系协同功能，即如何协调保护要求与遗产地内及周边居民的生存发展需求。游赏和居民调控专项规划是回应这两大功能的关键规划内容，其核心原则也将指导设施、土地利用等其他专项规划的制定。

在游赏利用方面，应围绕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价值主题展开，并以 OUV 作为其中最核心部分进行重点解说与展示。这要求规划不再偏重视觉审美，而应突出地质演化、生物多样性等核心自然科学与美学价值的表达，推动游客从“看风景”向“读遗产”的认知转变。在居民调控方面，应摒弃“人类活动干扰”的传统保护思维，转向将社区作为遗产的组成部分和协同管理的主体之一[25]。规划应系统识别并积极融入地方知识、传统生计方式与文化实践，通过开展如生态农业体验、生物文化展示与传统技艺传承等多元活动，实现遗产核心价值传播与地方文化传承的双向融合。

3 案例研究：武陵源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简称武陵源）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总面积 397.5 km^2。该区域于 1988 年被设立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92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之一。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范围整体涵盖世界自然遗产区及其缓冲区，其中遗产区面积约 264 km^2，其余部分为缓冲区。受申遗时技术条件所限，世界遗产中心保存的武陵源 WNH 边界数据为非矢量格式且不够精确，本研究

首先通过与图纸标识经纬度和现行行政边界的校准，确定遗产空间边界（图 3）。

武陵源以美学价值标准（vii）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26]。石英砂岩峰林、天然石桥、峡谷、瀑布、溪流、深潭及洞穴的地质地貌景观，加上茂密的阔叶林，共同构成其美学价值。此外，武陵源还为众多濒危动植物提供了重要栖息地，具有潜在的生物多样性标准（x）价值。因此，其 OUV 载体包括独特的地质地貌系统与生态环境，是构成世界遗产完整性要求的资源对象。其中，峰林地貌景观是最具代表性的核心遗产资源。

成为世界遗产后，武陵源因旅游开发压力而受到国际关注和批评[27]。尽管此后武陵源已采取生态搬迁、拆除违建等措施，但仍于 2014 和 2017 年因旅游设施压力、公路与建筑活动频繁等因素，连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列入“重点关注类”世界遗产名录[28-29]②。可见，如何通过风景区总规提升遗产保护效能，仍是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3.1 武陵源总体规划与世界遗产保护的衔接问题

本研究将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5—2020）》（简称《05 总规》）③为分析对象，从资源认知与价值评价、分区管控、游赏利用和社区调控策略 4 个方面深入分析武陵源总规存在的问题。

3.1.1 资源认知的体系性缺失与价值评价导向不明

《05 总规》未能识别融合 OUV 和风景名胜区价值的资源体系。规划虽涵盖峰林、水文、动植物栖息地与审美体验等内容（表 2），但对 OUV 构成要素识别不系统，缺乏与世界遗产价值体系的对应。地质方面，规划仅将峰林作为评价对象，未覆盖天生桥、方山、峡谷等关键石英砂岩地貌类型，也未识别古生物遗迹、岩溶景观等重要地质过程载体。生态方面，虽提及植被与动物栖息地，但未建立生态系统层级的完整结构分析。其次，对风景名胜区的文化景观基底价值认识不清。规划虽然将地方传统农业纳入保护对象，但以“农业空间”泛化呈现，缺乏对地方知识、生计模式与文化实践等文化-自然交互系统的认识，难以体现生物文化多样性价值[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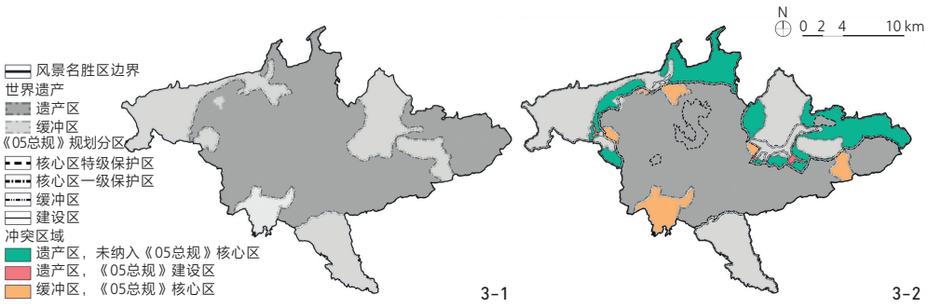
《05 总规》认知上的体系性缺失，直接导致价值评价导向不明，未能对包含 OUV 载体在内的资源进行价值分级。由于资源缺乏明确价值等级界定，规划难以为分级保护分区划定和管理对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3.1.2 分区边界与功能定位的双重错位

《05 总规》采用“核心区—缓冲区—建设区”三级空间结构（表 3），该体系与世界遗产“遗产区—缓冲区”结构存在边界与功能双重错位。具体而言，边界冲突主要表现为 3 类空间问题（图 3）。

第一类位于世界遗产区与风景名胜区建设区重叠区域，典型代表为东部城区。这些区域被规划为旅游集聚中心，形成高度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建设活动对 OUV 及其完整性构成直接威胁。

第二类区域处于世界遗产区范围内但未被风景名胜区核心区纳入。这类区域缺乏应有



3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5—2020）》分区空间对比
Spatial comparison of Wulingyuan WNH with the zoning in the “General Planning of Wulingyuan SHA (2005–2020), 05 General Plan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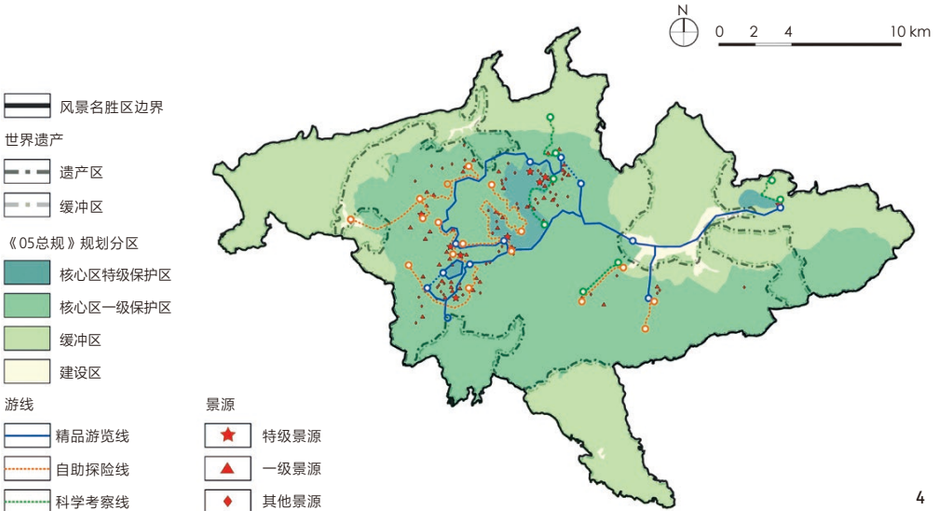
3-1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与缓冲区范围
Boundary of Wulilngyuan WNH and buffer zone
3-2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5—2020）》分区空间冲突
Spatial conflicts between Wulingyuan WNH and the zoning in the “05 General Plan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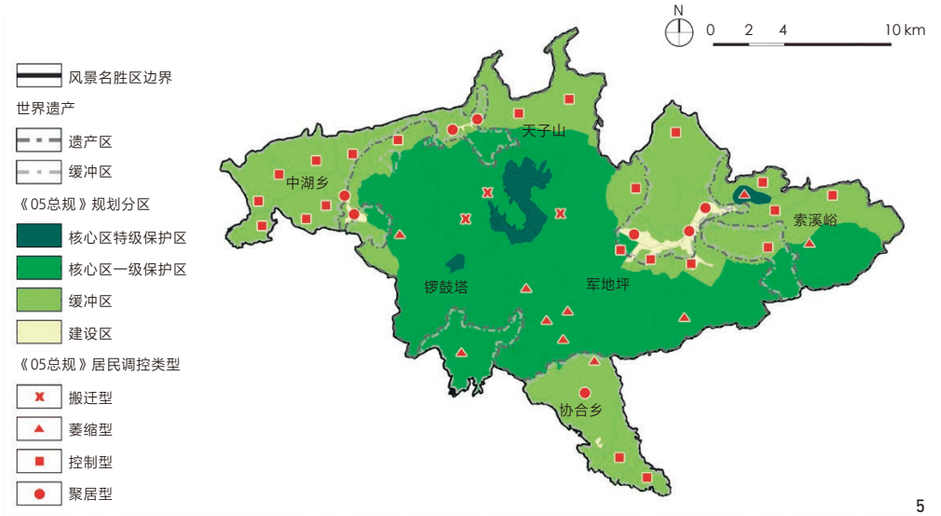
表2 《05 总规》资源评价对象与评价过程
Tab. 2 Resource evaluation objects and process in the “05 General Planning”

评价对象		评价过程
大类	小类	
石英砂岩峰林地貌	峰林	通过峰林分布密集程度划分保护等级
水文	溪河	通过溪河水文分析确定流域单元
地带性植被	珍稀植物、原始次生林	对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珍贵物种（23种）的分布点和原始次生林进行重点保护
动物栖息地	大鲵等6种动物	对哺乳类、雉鸡和两栖类代表性动物猕猴、红腹角雉和大鲵建立活动模型，识别安全格局；对3种鸟类和猕猴栖息地斑块进行识别
地方传统农业	农业空间	通过阻力模型识别传统农业空间扩展规律与适宜性区域
视觉与审美体验	峰林	针对不同游览线路进行峰林可视度分析

表3 《05 总规》分区与主要管控措施
Tab. 3 Zoning and regulations in the “05 General Planning”

分区	面积/km²（占比/%）	描述	主要管控措施
核心区特级保护区	9.8（2.47）	峰林景观最集中、岩溶景观分布或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的区域，存在少量农业活动	禁止人为活动（科研除外），资源绝对保育区
核心区一级保护区	207.4（52.18）		严格保护，自然游览可控开展，所有居民逐步搬迁
缓冲区	174.0（13.80）	核心区外围，承接保护压力	禁建过夜设施，作为绿色农业基地
建设区	6.3（1.58）	不影响遗产价值的区域，适宜开发	可建旅游设施，控制规模与风貌





4《05 总规》游赏线路规划
Recreation routes in the "05 General Planning"

5《05 总规》居民调控类型
Types of community regulation in the "05 General Planning"

的分级保护与政策支持，使部分 OUV 关键载体游离于管控体系之外，严重影响遗产完整性。

第三类区域位于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内但不属于世界遗产区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侧锣鼓塔一带。这类区域具备可持续利用潜力，却被严格限制开发，限制了社区与旅游发展。

除边界冲突外，现行分区的内在功能定位与布局也存在问题。核心区范围偏大，一级保护区面积广泛但管控粗放，缺乏基于资源差异的分区分类管理，难以实现精准保护。缓冲区则实行“只堵不疏”策略，禁止建设过夜设施，仅定位为农产品供给地，忽视了在分担旅游压力、支持社区经济与展示乡村景观等方面的潜力。

边界与功能的双重错位导致规划的实施效果不佳。尽管制定了严格的控制措施，但因缺乏与社区实际发展相匹配的治理策略，遗产区内多个乡村已涌现出大量未经许可的旅游接待设施，这不仅反映出规划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也暴露出空间调控与社区管理的协同缺失。

3.1.3 游赏体系未围绕遗产价值进行组织

《05 总规》的游赏规划未能有效解说与传播多层次的遗产价值。规划共识别约 370 处风景名胜资源（简称景源），其中明确分级与空间分布的景源仅 154 处，以地景为主；设置精品游览线、自助探险线与科学考察线 3 类游赏路线（图 4），但实际仅落实以大众观光为主的精品游览线。整体游赏体系在资源识别、线路设计与价值体验方面存在显著不足。

首先，对遗产价值认知的局限直接导致游线组织空间失衡。由于未能系统识别 OUV 载体和文化景观资源，现有游线集中于中部峰林密集区域，忽视了东侧一线天、白虎堂等具有美学与地质科学价值的世界遗产组成部分，以及遗产地内外的乡村景观资源，导致缺乏覆盖全域空间、价值导向清晰的路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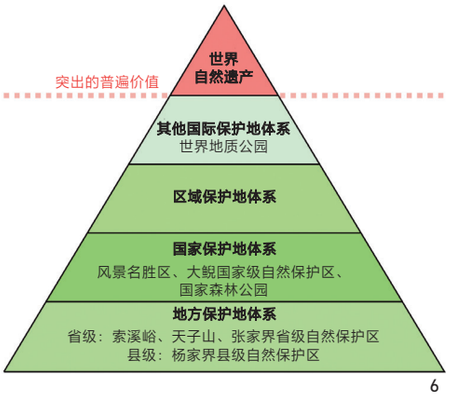
其次，游赏体系缺乏围绕遗产价值的主题设计与解说内容。规划未将自然美学、生态演化、地貌演变、乡村景观等核心价值转化为游览内容，也未构建相应的解说系统，难以引导游客实现“从感知到认同”的遗产理解过程。

最后，单一的游憩形式导致遗产价值的体验浅层化。现有游憩方式以观光为主，未能将地质地貌、生物景观与乡村景观转化为可供深度体验的生态教育、科学研究或文化感知产品。由于缺乏科学导览、文化解读、社区体验等复合型游憩方式的支撑，游客难以与遗产地建立深层次的情感与认知联系，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因此被极大削弱。

3.1.4 社区调控理念滞后与空间结构失衡

《05 总规》采取“堡垒式”（fortress）的保护模式，将社区排除在遗产治理和价值体系之外，明显滞后于当前强调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遗产管理理念。首先，规划将社区视为威胁而非资源，割裂了保护与发展的内在联系。《05 总规》提出对核心区内居民点实行生态搬迁措施，对位于核心资源外围的众多乡村均采取控制型的调控策略（图 5），限制乡村发展。其次，规划在空间上构建了以索溪峪镇为绝对核心的单极旅游服务结构，而将大部分拥有丰富风景资源和文化传统的乡村社区排除在旅游服务体系之外，进一步固化乡村社区的边缘地位。

这些策略的根本问题在于，未认识到社



6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融合 OUV 的多层次资源与价值体系
Multi-level resource and value system integrating OUV of Wulingyuan SHA

表4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OUV 载体及其数量
Tab. 4 Amount of attributes of WNH OUV in Wulingyuan SHA

分类			总数	备注
地质景观	地层遗迹		—	区域性分布，无法统计数量
	古生物遗迹		2处	大量分布，目前发现并现地保留共2处
地貌景观	侵蚀、剥蚀构造地貌		—	区域性分布，无法统计数量
	石英砂岩峰林地貌	平台、方山	—	区域性分布，无法统计数量
		峰林、峰丛、峰墙	3 103处	
		天生桥	2处	
		石门	3处	
		峡谷、峰谷	10处	主要沟谷
	岩溶地貌	漏斗和洼地	—	未统计数量
		溶丘、石芽和石林	1处（石林）	溶丘、石芽未统计数量
		溶洞	40余处	其中12处有命名
	河谷侵蚀堆积地貌		—	区域性分布，无法统计数量
	水文地质景观	河、溪流	37条	
		湖、潭	17处	
		泉	4处	
		叠水瀑布	7处	
		暗河、暗瀑	2处	数量众多，已知共2处
生物多样性	珍稀植物	保护与濒危植物	《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23种，《中国珍稀濒危植物名录》18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30种	
		古树名木	约1 365株	
		特有植物	中国特有科1个、准特有科2个，中国特有属30个，华中种子植物特有种81个	
		石英砂岩峰林植物	石生黄堇、巴山松等6种	
	珍稀动物	重点保护动物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6种，IUCN红色名录物种26种	
		特有动物	中国特有种脊椎动物30种	
	复杂生态系统		—	区域性分布，无法统计数量

区是遗产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播者。它们承载的地方知识、传统生计与文化实践，本是遗产价值解说与活化利用的重要资源。通过强制搬迁，规划不仅未能有效整合这些宝贵的乡土资源，使得大部分社区无法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反而加剧了资源保护与社区生计之间的紧张关系。

3.2 协同世界遗产保护的武陵源总体规划实践

3.2.1 重构资源价值体系与评价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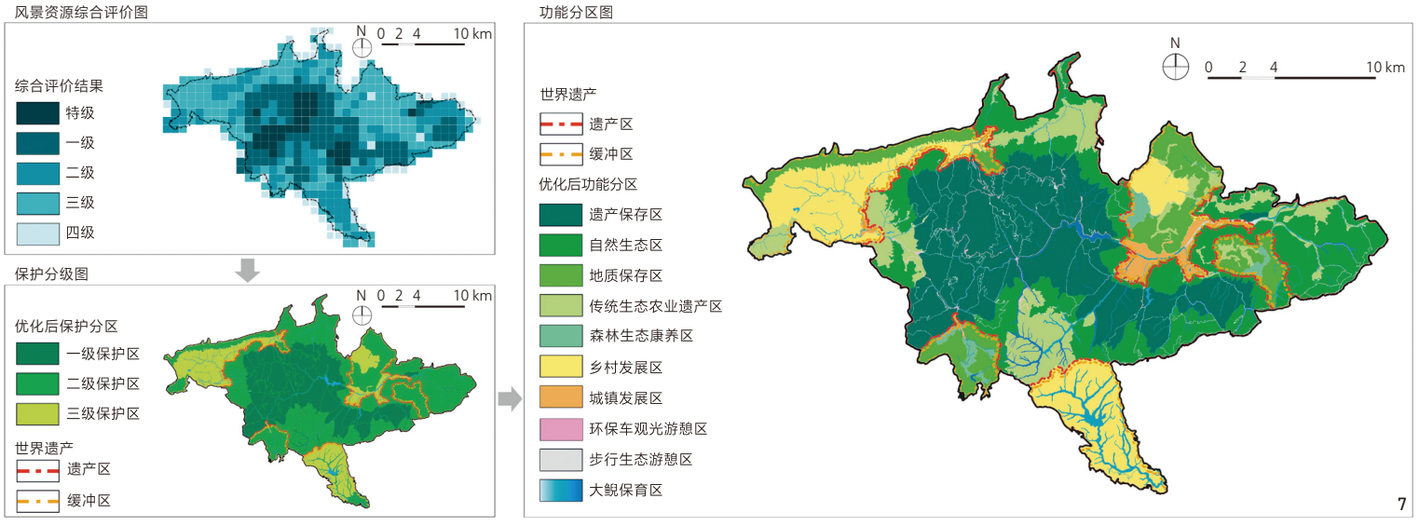
融合 OUV 等多层级遗产价值，构建体现武陵源自然文化完整性的多层次资源与价值体系（图 6）。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多学科专家团队实地踏勘等方法，对武陵源自然、人文及文化景观资源进行科学分类。通过对遗产申报文本、相关科学考察报告的深入研读，优化 OUV 载体的科学分类体系（表 4），重点补充《05 总规》未能认知的资源要素，如系统识别石英砂岩峰林地貌的完整类型（包括平台、方山、峰墙、天生桥、石门等），并对岩溶地貌、地层遗迹、古生物遗迹等进行补充，加强对珍稀物种、特有种及其生境完整性的梳理。除 OUV 载体外，规划亦充分肯定区域内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基底、人地和谐的乡村景观、承载地方信仰的关联性文化景观及红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元遗产价值。

在资源调查基础上，依据《标准》并融合世界遗产价值评估理念，本研究对所有识别的遗产资源进行综合价值评价，划分为特级至四级（图 7）。评价结果显示，承载 OUV 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及关键岩溶地貌被划定为特级，其他相关重要资源也被赋予高等级。这一评价过程明确了 OUV 载体清单及其空间分布。相较于《05 总规》，本次评价在资源类型和价值分级方法上均实现系统性拓展，为后续空间分区、功能设定与游赏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支撑。

3.2.2 协同分区空间边界与功能定位

构建协同世界遗产管理目标的保护分区与功能分区（表 5，图 7）。首先，对 OUV 载体进行系统识别和价值评级，确保保护分区划定有效实现世界遗产的保护。特级与一级资源（即 OUV 载体）被划入一级保护区，构成世界遗产的核心范围，实施最严格保护措施；二级、三级资源所在区域划为二级保护区，作为生态过渡和有限利用带；四级资源对应区域设定为三级保护区，兼顾利用功能。

其次，差异化的功能分区响应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的政策，为多类别资源保护和多元功能利用提供了明确指导，有效衔接总规中的保护和利用专项规划。在二级、三级保护区内，根据资源特征与发展需求，设立步行生态游憩区、传统生态农业遗产区、森林生态康养区和乡村发展区等多元功能分区。这一分区管控体系改变了《05 总规》中缓冲区“只堵不疏”的消极管控模式，为实现遗产保护与旅游及社区发展的协同提供支持。



7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资源评价与分区优化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evaluation results and zoning of Wulingyuan SHA

表5 衔接世界遗产保护目标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分区管控体系与政策

Tab. 5 Zoning and regulations of Wulingyuan SHA aligned with WNH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资源评价等级	保护分区	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政策				与世界遗产对应关系	与《标准》中功能分区对应关系
			游客活动	科研管理活动	居民调控	设施建设[b)]		
特级、一级	一级保护区	遗产保存区	禁止	审批后允许	疏解型	禁止	遗产区	特别保存区
		大鲵保育核心区	禁止	审批后允许		禁止	遗产区	
二级、三级	二级保护区	自然生态区	禁止	允许	控制型	控制	遗产区	风景恢复区
		大鲵保育缓冲区	禁止	允许		禁止	遗产区	
		步行生态游憩区	控制	允许		控制	遗产区	风景游览区
		环保车观光游憩区	控制	允许		控制	遗产区	
		传统生态农业遗产区	控制	允许	控制型	控制	遗产区与缓冲区	发展控制区
		地质保存区	控制	允许	控制型	禁止	缓冲区	风景恢复区
		大鲵保育实验区	控制	允许		禁止	缓冲区	
		森林生态康养区	控制	允许	控制型	控制	缓冲区	发展控制区
		乡村发展区（某红色文化村）[a)]	允许	允许	发展型	允许	遗产区	旅游服务区
四级	三级保护区	乡村发展区	允许	允许	发展型	允许	遗产区	
		城镇发展区	允许	允许	发展型	允许	遗产区	

注：a）该乡村发展区被划分为二级保护区，是为落实对红色文化资源的高等级保护，但整体区域采用一般乡村发展区同等的管控策略。

b）除监测、防护、防灾及其他和保护无关设施外。

此外，保护与功能分区划定充分考虑与世界遗产和缓冲区边界的协同。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在保持总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对原世界遗产边界进行了精确的矢量化微调，将部分已高度城市化的区域调出遗产区，解决不当建设的历史矛盾。最终形成的分区管控格局既确保多层次价值得到严格保护，又为可持续旅游、科研监测、文化传承和社区经济发展预留了充足空间，为后续策略制定奠定了科学合理的空间基础。

3.2.3 构建围绕价值解说的游赏体系

围绕遗产价值解说与展示构建游赏体系。首先，基于资源与价值识别结果筛选景源，同时凝练出地质地貌、生物多样性、红色文化、兵战遗址、乡村与民俗五大主题类型，为不同体验层次提供内容支撑。其次，以价值主题为引领，根据遗产资源特征、空间分布、环境承载力等潜在的游憩机会，策划六大游赏主题，包括自然美景风光游、世界遗产科普游、自然生态探险游、兵战文化追踪游、红色文化缅怀游以及田园风光民俗游。其中前三类主题直接对应 OUV 构成要素，分别突出宏大审美、科学内涵与深度生态体验，构建价值导向明确的传播体系（表 6）。

相较《05 总规》，基于更系统的资源分类，识别景源共 308 处，并明确其空间分布，其中自然景源 228 处、人文景源 43 处、文化景观景源 37 处，从而实现游赏线路在遗产区内的空间均衡布局（图 8）。更重要的是，每类游赏主题均明确价值解说重点，通过游览路径、解说系统和体验活动，强化对 OUV 的深度传播与公众认知。同时，通过对不同游线在交通方式、服务设施配置和游客聚集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化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游憩机会，实现了遗产保护与高品质游憩体验的协同。

3.2.4 优化社区发展格局与制定策略

将社区重新定位为遗产价值的活态组成部分和遗产保护的共建主体，制定保护与发展协同的社区发展策略。以差异化的空间引导策略，实现人地关系再平衡（表 5）。首先，根据社区所处的保护分区确定居民点发展类型，划分“疏解型”“控制型”“发展型”3 类。其次，以多元化的功能分区定位重塑社

区的积极角色。明确位于不同功能分区的社区的发展路径，“传统生态农业遗产区”位于遗产区内部，以保护传统农业与乡村景观为核心，建筑形式与旅游接待强度均受到严格控制；而“森林生态康养区”“乡村发展区”和“城镇发展区”主要分布于缓冲区，分别承担生态康养、特色农业与综合服务职能，成为支持遗产保护的重要外围系统。最后，结合各社区资源禀赋详细引导各村庄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激活社区的内生动力，形成更为均衡的乡镇发展格局。总体来看，优化结果在价值认知、功能定位、发展空间结构和发展策略等方面回应了社区多元诉求，推动形成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协同共赢的治理格局。

4 结论

对于兼具风景名胜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双重身份的自然保护地，其风景区总规在价值认知、分区管控和管理目标导向上，与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要求存在衔接障碍。这不仅削弱了遗产价值的有效保护与展示，也加剧了遗产地的人地矛盾，是中国自然遗产地保护实践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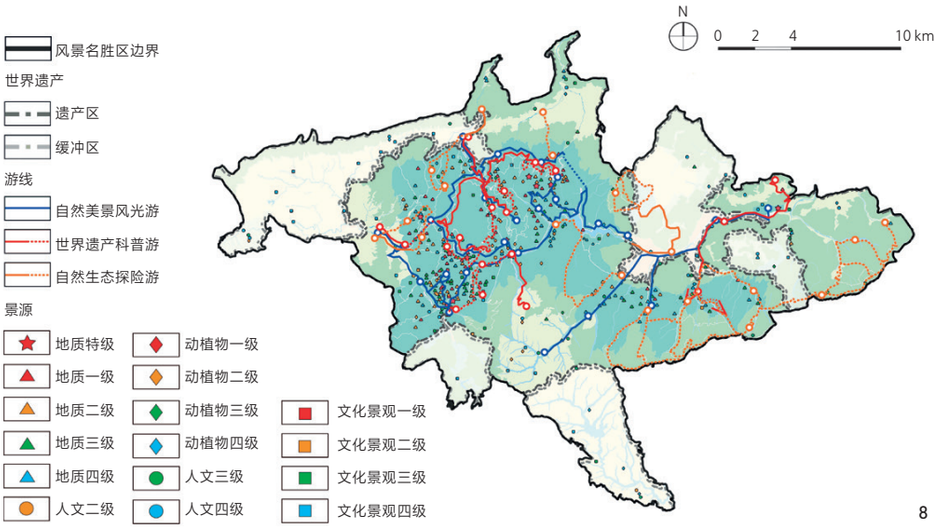
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价值体系和管理目标及其边界为关键协同对象的规划方法框架。一是在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多元遗产要素中识别 OUV 及其载体；二是分区加强与遗产区及缓冲区边界及其管理目标的衔接；三是在专项利用策略上优化游憩体验与社区发展，强化遗产价值展示与地方参与。武陵源的规划实践表明，将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导向和管理理念融入风景区总规，不仅提升了规划对全要素资源及其价值的保护与解说能力，还有效平衡了资源保护、旅游利用与社区发展的关系。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处理中国风景区与世界自然遗产的规划协同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成果为同类自然保护地提供了一套技术路径与实践参考，即在尊重中国风景区“天人合一”景观特征的同时，又融入国际保护框架，并响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下精细化空间治理与“多规合一”的时代需求。该探索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制下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提供方法参考。

表6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围绕OUV 的游赏利用系统

Tab. 6 Recreation systems based on OUV in Wulingyuan SHA

价值主题	游赏主题	价值解说重点	游憩利用机会		
			交通方式	游赏服务设施	游客聚集程度
地质地貌景观与生物多样性	自然美景风光游	地貌景观与动植物构成的自然美	车行为主，交通设施便捷	相对较多	较高
	世界遗产科普游	地质演化与生物、生态系统的科学价值	以步行为主，游步道经过建设	较少	中等
	自然生态探险游	以科学价值为主	以步行为主，游步道未经建设，保留原始风貌	只有基础设施	低



8

8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围绕 OUV 的游赏主题线路

Recreation Routes based on OUV in Wulingyuan SHA

致谢 (Acknowledgments):

感谢郭晓彤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注释 (Notes):

① 文化遗产需要符合真实性的条件，所有遗产必须满足完整性条件。笔者的研究对象为世界自然遗产，因此只需讨论完整性。

② IUCN 从 2014 年开始，每 3~5 年对全球世界自然遗产进行评估，根据保护状况将遗产划分为 4 个等级：良好（good）、良好且部分关注（good with some concern）、重点关注（significant concern）和危急（critical）。

③ 因新版总规还未正式批复，故基于此版总规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UNESCO.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EB/OL]. (1972-11-16) [2025-07-04]. https://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

[2] UNESCO. Managing Natural World Heritage[M]. Paris: UNESCO, 2012.

[3] 石春晖，代莹，宋峰.世界遗产保护制度与中国本土化保护体系关系：基于风景名胜区制度的探讨[J].中国园林，2016，32（3）：75-79.

SHI C H, DAI Y, SONG 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System and China's Localized Conser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amous Scenic Site System[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6, 32 (3): 75-79.

[4] 彭琳.风景名胜区整体价值识别与保护[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

PENG L. Ident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Holistic Value of National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21.

[5] 韩锋.世界遗产“文化自然之旅”与中国文化景观之贡献[J].中国园林，2019，35（4）：47-51.

HAN F. The World Heritage “Culture Nature Journe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Landscape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9, 35 (4): 47-51.

[6] 庄优波.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实践概述[J].中国园林，2013，29（9）：6-10.

ZHUANG Y B. Overview of Management Planning Practice for Chines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3, 29 (9): 6-10.
[7] 贾丽奇，郭华敏.《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关于“缓冲区”条款的修订解读[J].规划师，2015，31（S2）：42-45,49.
JIA L Q, GUO H M. Analysis of the Revision About the Buffer Zone of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J]. Planners, 2015, 31 (S2): 42-45,49.
[8] 李如生.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城市规划，2011，35（5）：38-44.
LI R S. Current Stat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Protection in China[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 (5): 38-44.
[9] 杨锐，王应临，庄优波.中国的世界自然与混合遗产保护管理之回顾和展望[J].中国园林，2012，28（8）：55-62.
YANG R, WANG Y L, ZHUANG Y B.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orld Natural and Mixed Heritage in China[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2, 28 (8): 55-62.
[10] MERODE E D, SMEETS R, WESTRIK C. Linking Universal and Local Values: Manag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World Heritage[EB/OL]. [2024-09-19].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7777.
[11]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World Heritage and Buffer Zones[M/OL]. France: UNESCO -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9[2022-09-19]. https://whc.unesco.org/en/series/25/.
[12] IUCN.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Natural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 A Resource Manual for Practitioners[M/OL]. Switzerland: IUCN, 2008[2025-07-04].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efiles/documents/2008-077.pdf.
[13] UNESCO.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EB/OL]. [2025-07-04]. https://whc.unesco.org/en/guidelines5.
[14] MAGIN C, CHAPE S. Review of the World Heritage Network: Biogeography, Habitats and Biodiversity: Final Draft[EB/OL]. [2021-11-29].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node/12800.
[15] GATW. Report to APEC on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Advancing Sustainable Tourism at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Sites[R/OL]. [2025-07-04]. https://www.apec.org/docs/default-source/Publications/2010/12/Advancing-Sustainable-Tourism-at-Cultural-and-Natural-Heritage-Sites-Mogao-Caves-World-Heritage-Site/210_twg_Advancing SustainableTourism.pdf.
[16] UNESCO. UNESCO World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Programme[EB/OL]. [2025-07-04]. https://whc.unesco.org/uploads/activities/documents/activity-669-7.pdf.
[17] SHEPPARD D. The New Paradigm for Protected Areas: Implications for Managing Visitors in Protected Areas[C]//SIEGRIST D, CLIVAZ C, HUNZIKER M, et al.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Visitor Flows in Recreational and Protected Areas. Rapperswi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Rapperswil, 2006: 33-45.
[18] MALLARACH J M, VERSCHUUREN B. Changing Concepts and Values in Na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 View Through Iucn and Unesco Policies[M]//AVRAMI E, MASON R, MACDONALD S, et al. Values in Heritage Management: Emerging Approach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Los Angeles: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9: 141-157.
[19] 贾建中.我国风景名胜区发展和规划特性[J].中国园林，2012，28（11）：11-15.
JIA J Z.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Characteristics of Scenic Areas of China[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2, 28 (11): 11-15.
[20] 邓武功，贾建中，束晨阳，等.从历史中走来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下的风景名胜区定位研究[J].中国园林，2019，35（3）：9-15.
DENG W G, JIA J Z, SHU C Y, et al.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out of History: Study on the Positioning of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Based on the Nature Reserve Area System[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9, 35 (3): 9-15.
[21] 刘秀晨.风景名胜区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独立类型[J].中国园林，2019，35（3）：1.
LIU X C.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 Are the Independent Type of China's Nature Reserve System[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9, 35 (3): 1.
[22] 李晓黎，韩锋.中国风景名胜之潜在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价值贡献[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8）：118-124.
LI X L, HAN F. Potential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Values in China's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22 (8): 118-124.
[23] 唐军.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4.
TANG J. General Planning of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s[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24.
[24] 徐青.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价值体系研究：以庐山为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XU Q. Study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Value System of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
[25] 韩锋，郭晓彤，杨晨.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乡村景观保护与发展协同：以武陵源中湖乡为例[J].风景园林，2022，29（10）：89-94.
HAN F, GUO X T, YANG C.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scape in China's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Zhonghu Township, Wulingyuan[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2, 29 (10): 89-94.
[26] World Heritage Center. Wulingyuan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EB/OL]. [2025-05-08]. https://whc.unesco.org/en/list/640.
[27] 韩锋.世界遗产武陵源风景名胜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0.
HAN F. World Heritage: Wulingyuan Scenic and Historic Interest Area[M].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0.
[28] IUCN. IUCN World Heritage Outlook 2014: A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of all Natural World Heritage Sites[M]. Gland: IUCN, 2014.
[29] IUCN. IUCN World Heritage Outlook 2017: A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of all Natural World Heritage[M]. Gland: IUCN, 2017.
[30] ICOMOS. ICOMOS-IFLA Principles Concerning Rural Landscapes as Heritage[EB/OL]. (2017-12-17)[2025-06-05]. https://www.icomos.org/images/DOCUMENTS/Charters/GA2017_6-3-1_RuralLandscapesPrinciples_EN_adopted-15122017.pdf.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表 1 由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3] 绘制，其他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编辑 / 王一兰）

作者简介：
韩锋 / 女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ICOMOS-IFLA 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 IUCN 世界保护地委员会专家 / 本刊编委 / 研究方向为环境哲学、文化景观遗产保护
franhanf@qq.com

程安祺 / 女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风景名胜区规划、文化景观遗产保护

HAN F, CHENG A Q. Integrating World Na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to the General Planning of China's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6, 33(4): 62-71. DOI: 10.3724/j.fjyl.LA20250405.

Integrating World Na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to the General Planning of China's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

HAN Feng, CHENG Anqi

Abstract:
[Objective] The on-site conservation of World Natural Heritage (WNH) properties depends on th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of their host countries. In China,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s (SHAs) are central to the

statutory protected area system and serve as the primary institution for nominating and managing WNH and Mixed Heritage. However, a significant gap persists: while WNH conservation prioritizes natural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 SHAs are traditionally rooted in a dual natural-cultural philosophy that emphasizes 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the holistic value of cultural landscapes. Consequently, the general planning of SHAs often fails to align with WNH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bridge the methodological gap between SHA general planning and WNH management to provide a robust technical pathway for the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nd governance of WNH in China.

[Methods] The research adopts a multi-stage analytical approach. First, it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best practices for WNH conservation. Key requirements are examined, includ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OUV and its integrity, the adoption of zoning for differentiated conservation, and the involve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 i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Second, these requirements are then compared with current SHA general planning practices in China.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several disconnects: 1) a lack of systematic recognition of OUV and its attributes in resource inventory and evaluation; 2) the zoning approach that prioritizes visual aesthetics and tourism facilities over ecological and geological integrity; 3)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through restrictive management policies. Based on this diagnosis, a coordination framework is proposed centered on value systems, management objectives, spatial boundari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inally, the framework is tested through an application to the Wulingyuan SHA, inscribed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in 1992 for its unique quartz sandstone landform.

[Results] The proposed coordination framework comprises three interrelated components designed to strengthen the alignment between SHA general planning and WNH conservation. First, a multi-level resource and value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incorporates OUV and its attributes into the broader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structure of the SHA. Through comprehensive resource inventory and evaluation, geological, ecological, and associated cultural attributes are hierarchically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onship to OUV. This approach clarifi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re OUV attributes and ensures that they receive the highest level of protection within the planning system. Second, a coordinated zoning system is developed to align general planning zones with the official boundaries and management objectives of WNHs and their buffer zones. This ensures the protection of core OUV attributes while providing space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ird, special planning strategies are formulated to support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Wulingyua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framework demonstrates its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In terms of resource evaluation, OUV attributes were systematically reassess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an expanded resource inventory. Heritage resources were identified across geologic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Core quartz sandstone peak-forest landforms and key ecological attributes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OUV were assigned the highest protection level, establishing a clearer hierarchy of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Regarding spatial coordination,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previous general planning zones and WNH boundaries were addressed through boundaries alignment and differentiated zoning regulations. Core heritage areas were placed under strict protection, while compatible areas were reorganized to support ecological buffering and controlled development. This restructuring reduced spatial conflicts and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with respect to utilization and community livelihoods, thematic interpretation routes were organized around geological and ecological values, strengthe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OUV within tourism activities. Management zones such a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eritage Zones were introduced to integrate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with loc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Community roles were redefined from passive regulatory subjects to active participants in heritage management, contributing to a more balanced relationship among conservation, touris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verall, the Wulingyuan case indicates that embedding WNH management principles into SHA general planning enhances the statutory planning's capacity to protect and interpretation of OUV and its integrity.

[Conclus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structural misalignment between SHA general planning and WNH conservation, rooted in inconsistent value hierarchies, zoning logics, and management priorities. The absence of an explicit mechanism for incorporating OUV into statutory planning has limi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 situ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weakened the coherence of spatial governance within WNH in China. By proposing a coordination framework centered on value hierarchy, management objectives, and spatial boundary alignment,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requirements can be translated into operative domestic planning instruments.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moves beyond traditional aesthetic-oriented planning by advancing a value-based coordination model that connects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frameworks with Chinese landscape tradition. Practically, the findings serve as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multi-plan coordination" (多规合一)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ongoing protected area reform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More broadly, as China continues to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Wulingyuan case demonstrates the sustainable governance of landscapes with both national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heritage conservation;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general planning; world natural heritage; Wulingyuan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Authors:

HAN Feng, Ph.D.,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vice president of ICOMOS-IFLA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Landscapes (ISCCLs), expert member of World Commission of Protected Area (WCPA) of IUCN, and an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is journal.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conservation.

franhanf@qq.com

CHENG Anq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scenic and historic area planning, and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conservation.